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王庆祥 著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交往的史实，
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代皇帝与新中国首代
领袖，在共同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相互
交往的完整记录，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
章。它凝聚了百年历史风云，反映了广袤大地上
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还集中了人民及其领袖的斗争
艺术，这是胜利者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成功
的艺术。这些在新旧社会交替演进中显然是
最具典型意义、最生动的历史情节。在
爱新觉罗·溥仪身上，可以体现辛亥
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和抗日战争的伟大成
果，能够看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王庆祥 著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王庆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

ISBN 978-7-01-010522-2

- I. ①毛… II. ①王…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②周恩来(1898~1976)-生平事迹 ③溥仪(1906~1967)-生平事迹
IV. ①A752 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8107 号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MAOZEDONG ZHOUENLAI YU PU YI

王庆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522-2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再 版 前 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也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和九一八事变 80 周年的极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因为这三件大事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大和最有影响的事件,它们与两个响亮的伟大名字——孙中山和毛泽东紧密关联,特别是与中国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和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关联。

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战争,它们树立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和革命传统,至今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全国人民和一代代青年,且已经汇流为伟大祖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一书就存在于这种精神的光影之中,而得以一版再版畅销发行,今又重印,更具非一般的特殊意义。

溥仪显然也是这三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溥仪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皇帝,同时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对象,并在革命中被打倒而宣告退位。然而,在这之后他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舞台。他利用历史的影响和中国旧军阀,甚至利用对中国怀有各种政治企图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借以恢复从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结果反而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他们侵华的帮凶,出卖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抗日战争中的革命对象。正处于从 26 岁至 40 岁人生成熟时期的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康德皇帝,随着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成为国家罪人。他经历了伪满垮台后的逃亡、被俘、囚苏和引渡,最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10年的成功改造,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公民。

溥仪能够得到如此人生圆满,而连他自己也深感意外地远离了刑场和绞架,则因为他有幸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关爱和帮教下,实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唯一,天地间的奇迹。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周恩来大量而感人的具体工作,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的目标就是要梳理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会谈中,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斯大林支持了新中国,决定将溥仪交给毛泽东。经周恩来与苏方商定:1950年8月1日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将溥仪与随从人员以及伪满大臣移交中国政府。溥仪登上回国列车后想到马上将被枪决,彻底绝望,曾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后被监押卫兵及时发现救下。在绥芬河火车站中方代表接收时,溥仪立即伸出双手准备戴手铐。然而,他完全想错了!

毛泽东把溥仪引渡回国,绝不是要处决他。对此,毛泽东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明确且始终一贯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演讲《论十大关系》,一锤定音,敲定了溥仪的命运,也为他择定了后半生的道路:对“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等,“不杀头”,“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给饭吃……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6年2月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当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把溥仪的七叔载涛引荐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肯定“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建议他“带家属”前往抚顺探亲。随后,周恩来就把此事交给北京市长彭真,迅即落实。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改造,而不是简单处决。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历史回归:“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个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

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由此引发思考,革命绝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旧皇帝,而是要从思想根源上挖掉培植皇帝的土壤。

1959年9月14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毛泽东作出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无论溥仪本人、同监战犯、还是管理所各级干部都没有料到。

1960年5月9日,毛泽东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运用溥仪“改造好了”这一事例,来说明“统一战线和团结”这一条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继而又不止一次把中国末代皇帝推荐给拉丁美洲国际友人,他们也都接受建议,前往北京植物园与溥仪见面。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会见以米尔莱为团长的古巴青年代表团时说:“阶级是可以改造的,溥仪也可以改造。”继而介绍溥仪特赦前后状况,认为“溥仪是改造比较好的一个”,对改造溥仪很有信心。至此,溥仪已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例证而走向世界了。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邀请溥仪在家中小酌,原民国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的同盟会成员程潜、同盟会和辛亥革命首倡者之一仇鳌以及毛泽东世交与远亲王季范等革命家或社会贤达陪席。在“湘味家宴”餐桌旁,毛泽东给溥仪提了“结婚成家和修改好回忆录”两条建议,溥仪记住且照办了。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谈到对宣统皇帝“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

1963年11月1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谈及司法工作又举出溥仪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1963年11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比达·罗德里格斯再次谈到溥仪:他的经历证明,人是应该教育的,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够变化的。这是社会革命和进步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

1964年2月13日,旧历正月初一。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春节座谈会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听说溥仪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遂委托章士钊“拿点稿费”送给溥仪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再谈到“中国

的皇帝”。先说溥仪的工作和生活,又与皇帝时代相比较,“可见人是可以改造的。但不能强迫,要劝他自觉,不能强压”。

1965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贡代·塞杜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法迪亚拉说,他曾与张鼎丞、董必武谈过,知道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已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能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毛泽东说,对“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这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尚未忘记当年“康德皇帝”以惩罚在自己身上留下累累伤痕的原伪满皇宫“童仆”,以写信方式最早批判《我的前半生》,扬言“呼吁全国工农兵”参加批判,勒令溥仪把全部稿费退还国家。溥仪第二天就把数千元稿酬送交全国政协机关,但这并不能结束批判。那位“童仆”提出的问题愈来愈多,占用的篇幅愈来愈长,吹出的调子愈来愈高。正当溥仪和《我的前半生》都处在四面楚歌境地,一张印着毛泽东与一位亲属中晚辈谈话内容的红卫兵传单闪出来,肯定溥仪已经“改造过来了”。对于溥仪那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无疑起到巨大的政治保护作用。1966年国庆节,溥仪仍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纪念活动,这同样是一种政治保护。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溥仪的生命时钟终于停摆。他最后的春秋是在毛泽东保护之下和周恩来更具体地关照之中度过的,上缴的稿费退还了,夫人李淑贤的住房问题、生活问题解决了,他安心地合上了双眼。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溥仪,20世纪的世界也没有忘记这位当过皇帝的公民。

1971年10月8日,毛泽东与年近八旬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正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亲切交谈。海尔·塞拉西提出要见一见宣统皇帝,毛泽东告诉他,这位皇帝已在4年前病逝。塞拉西闻讯扼腕长叹,惜乎夙愿难偿。其后塞拉西由周恩来陪同着意参观了中国明清两代帝王的宫廷和溥仪青少年时代居住过的紫禁城。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已经历政治成熟期。溥仪由皇帝到公民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改造,而是一项政策的成功和意义深远的胜利。毛泽东的话表明,溥仪的出路在中国,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路也在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交往的史实,是新中国首代领袖与中国封建社会末

代皇帝,在他们共同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相互交往的完整记录,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它凝聚了百年历史风云,反映了广袤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还集中了人民及其领袖的斗争艺术,这是胜利者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成功的艺术。在新旧社会交替演进中显然是最具典型意义最生动的历史情节。

在爱新觉罗·溥仪身上可以体现百年辛亥革命、90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和抗日战争的伟大成果,能够看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历程。由此说来,《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的再版,确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我感谢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先生慧眼识珠,早在20年前就让我得到机会,把本书呈现在亿万中国人民面前。今又再版,真诚希望能有更多读者一阅,也希望听到万千朋友们不吝赐教。

2011年6月12日写于长春

序 言

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改造问题

廖 盖 隆

王庆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爱新觉罗·溥仪,即研究溥仪怎样从清朝末代皇帝、日本傀儡满洲国皇帝被改造成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专家。他把他的新著《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交给我看,并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毫不怀疑,正如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根据王庆祥关于溥仪的著述改编而成的28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曾经大受欢迎、并在电视台反复播放一样,这本书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从这本书中将会了解到,溥仪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伟大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关注并且直接做了许多工作的情况下,才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的。

毛泽东、周恩来之所以关注并且直接进行改造溥仪的工作,当然可以说是为了把他们都曾经当过他的臣民的这个末代皇帝改造好。但是他们这样做决不仅仅是为了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解决把数千万过去的压迫者、剥削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主张要尽可能地用最合理、最人道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并且最好是用赎买的方法(即阶级和平的方法)来消灭剥削阶级。1871年4—5月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

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的阶段。”①恩格斯在1894年11月所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引用者)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使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②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懂得了宽大地对待被俘虏的敌军官兵(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搜他们的腰包,给他们治伤,愿去者发给路费、愿留者欢迎),宽大地对待革命根据地内的地主、富农,给他们以生活出路(至于对中间阶级要争取、团结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孤立和分化、瓦解敌军和敌对阶级,顺利地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实行宽待俘虏,保护民族工商业、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等正确政策。然而“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者却反对这些正确政策。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的党内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对小资产阶级(指对中小工商业者、小地主、富农)的政策,我们在今年2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3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4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这就造成了所谓“中间阶级反水”的严重问题。1933年“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进入江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

苏区以后,更把毛泽东实行的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的正确政策,诬称为“富农路线”和“一贯的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改而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张国焘领导的川陕根据地,也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收工商业,对地主富农以致对农民竭泽而渔,终于耗尽了川陕地区的财力物力人力,因而不可能再在那里继续坚持下去。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整个说来是坚持执行了正确的社会政策的,包括争取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广泛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原来的压迫、剥削者给予生活出路正确政策在内。但是在战争激烈进行的1947年下半年,在许多解放区,又一度发生了对地主“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的“左”倾危险偏向。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发现了并及时纠正了这个危险的偏向。当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对地主富农之所以不能乱打乱杀,而要坚持少杀,严禁乱杀,并且要给他们以生活出路和加以改造,这是因为一则,这样做可以取得社会同情,稳定人心;二则,为数达到3000多万的地主富农,这是国家的数量可观的劳动力,是一批不小的生产力。他为中央起草在1948年1月18日发出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过人民法院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3.6亿农村人口中占有约3600万人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予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任弼时在1948年1月12日所作、随后经中央批准转发作为全国土改工作的指导文件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对于这点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我们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不采取消灭政策。对一切地主除少数汉奸及内战罪犯经法庭审判定罪者外,均应

按土地法大纲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我们如果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去偷、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即使是犯罪分子,只要其犯罪程度未至经法庭判决枪毙者,亦必须分给必要的土地财产,社会秩序才能安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他又说:“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地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100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资产阶级尚且提出这种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

经过纠正偏向,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得到了比较健康的发展。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老区的土改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头两三年内新区的土改也是如此。当然,毋庸讳言,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批判这个或那个错误思想等项工作,都是采取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即在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仍然采取激化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程度的扩大化现象,包括在土改中发生某些多杀人乱杀人的现象。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是采取和平的方法进行的,这就是如同周恩来所说的,经过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协商,保证改革后他们的生活不降低,从而取得他们的同意以后进行的。事实证明,这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缓解阶级矛盾从而达到解决阶级矛盾的更加健全的万法。新中国成立后初期,叶剑英对广东的侨乡也实行过和平土改,效果很好,对于争取广大华侨拥护新中国很有必要。但是可惜,这个正确做法后来却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纠正”。

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在经济上赎买、在政治上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的和平方法进行的。民族工商业家始终享有选

举权,被当作团结对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们已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

就全体而论,我国对原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改造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用最合理、最人道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的原则的。毛泽东在概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时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强迫施行的,和我们对于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这里说到了对于原来是压迫者、剥削者的人的改造带有强迫性(例如,假使他们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又要很用心、很充分地向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的问题。就是说,改造还应该是强迫和自愿相结合的。因为改造,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而思想问题,是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来解决的。但要说服人,就要尊重受说服者的人格(即人权),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为什么要改造和如何改造的道理对他们讲清楚,还要针对受说服者的思想顾虑,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

周恩来对溥仪等做的宣传教育工作,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溥仪、杜聿明等首批在10天前被特赦的战犯中的11个人。他是同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徐冰一起同这些被特赦人员见面的。他不但一一向溥仪等被特赦人员介绍了陪同接见的领导人,而且同溥仪拉起家常来,谈到满族旗人的礼节、服饰和相貌特征等。周恩来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你们是标兵,要经得起考验,要给人以好的印象。”他严肃地说,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不择手段,而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他向被特赦人员作了长篇讲话,讲了4个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指出他们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其次是要去掉剥削阶级的立场,站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第二是观点问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周恩来指出社会主

义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有机会劳动锻炼，对你们还有必要。10年来你们参加生产劳动，改变了生活方式，要坚持下去。10年改造，你们过着集体生活，有了一定的集体主义观点，应该加以巩固。群众观点，其实就是集体观点的延长。群众观点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共产党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6亿5千万人民。第三是工作和生活问题。工作、生活、劳动、参观学习要好好安排一下。参观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进一步了解国内情况。第四是前途问题。周恩来对溥仪等11位被特赦人员说：“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你们做得好，仍然关押的人会感到更有希望。他们改造得好，也可以分批处理，这对社会有好处。你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旧的社会联系多，可以用你们的亲身感受，帮助改造社会上的死角。溥仪先生可以起到我们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所说的当时仍在关押的那些战犯，后来已在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及其后，全部被分批释放。）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溥仪和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叔父载涛，弟弟金友之，妹妹金欣如、金蕊秀、金韞馨、金韞娱、金志坚等。他的七妹金志坚是说过不愿看见溥仪的，这次也来了。这次周恩来主要是找溥仪征求他对工作和生活安排的意见的。周恩来亲切地对溥仪说，改造思想，第一要有客观环境，第二要靠主观努力。又说：现在民族平等了，各民族共同发展。满汉要团结得更好。你要努力学习，搞出点成绩来，这对你个人有好处，对人民有贡献，对满族也有好处。

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溥杰的夫人日本人嵯峨浩等。他广泛地谈到了清朝的功过，溥仪、溥杰的责任，满族应有的地位，以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必要等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了溥仪兄弟等的思想顾虑。周恩来说：“满族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300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来负。溥仪、溥杰合作写的书（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揭露了这一点。你们的

书应该修改一下再出版,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那些事情都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事实上1949年以来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周恩来又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定下来了,有900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步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三方面做了好事。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吸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是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关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必要,周恩来对嵯峨浩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向外扩张,这是坏事。1894年、九一八、七七再加上满洲国使中国受了很大损害。解放10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2000年的来往,发展了文化交流,同近2000年比起来,50年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

周恩来以上的这些含义深刻的谈话,使溥仪等大大开阔了眼界,受到了难忘的教育。特别是1959年12月的那次讲话,溥仪、杜聿明等把讲话的精神归纳为爱国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崇敬地称之为“四训”,以作为他们今后的行动准则和前进方向。

说到思想改造,其实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就是共产党人自己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周恩来就常常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句话来和党外朋友共勉。

毛泽东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来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可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

人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经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其后,我国被定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四类分子(当然都不包括他们的子女)的人,共计有 2000 多万人。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被摘掉了“帽子”;剩下不足 10 万人的“帽子”也已在 1984 年底前被全部摘掉。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压迫者、剥削者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

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的,不是仅有一个薄仪,而是有 2000 多万个大大小小的“薄仪”。我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十分强调对人的思想改造,包括对几千万原来的压迫者、剥削者的思想改造,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序言 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改造问题	廖盖隆(1)
1 创举	(1)
2 伟大胸襟	(9)
3 引渡	(20)
4 “藏”在抚顺	(28)
5 北迁南返	(34)
6 侦讯	(42)
7 最高会议上的决策	(48)
8 从通信到探亲	(56)
9 高墙内外	(66)
10 “赦字 011 号”	(75)
11 西花厅内的握手	(87)
12 周恩来论立场	(92)
13 谆谆“四训”	(97)
14 跨进新生活	(101)
15 面商工作安排	(107)
16 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团圆	(113)
17 走向世界的园丁	(124)
18 摇篮中的著作	(136)